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李增添 毛琳

我们党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致力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等重要改革举措。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是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等规定,加强党委农村工作体系建设,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更大力度推动重农强农惠农。二是锻造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重用艰苦地区、关键岗位工作表现突出的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增强干部做好“三农”工作的本领。三是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能生搬硬套、“一刀切”。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制度创新和要素投入,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引导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农情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

置改革”“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改革举措,切实保障农民合作经营、增收致富等权益。一是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合理规划、整合农村资源,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进而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二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领农民共同富裕的功能作用,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积极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途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三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的技术突破、要素适配与知识支撑。通过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土地流转经营方式、市场运作机制和科技创新手段,可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而实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应。

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推进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对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等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积极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针对农村存在的婚丧陋习、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做好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摒弃陋习、树立新风。要创新移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发挥优秀农耕文化教化作用,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二是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支持建设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设施,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

动,开展文明村镇、最美家庭、身边好人等评选活动,开展“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致力提升农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三是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要挖掘和培养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促进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乡村既是农业生产的载体,也是农民生活的家园。要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村具备现代化生产生活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等改革举措,为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支撑。一是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突出地域特色、乡村特点和时代特征,严格保护农业生产空间和乡村生态空间,加大农村道路、供水、供电、信息网络等改造提升力度。例如,加强乡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加强防汛抗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确保农民出行便捷、生活便利。二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根据政策要求、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对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和农民生产生活需求,注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等工作,全面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三是切实保障和改善农民民生。要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构建农民工、脱贫人口等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完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健全农民社保制度体系,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城乡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促进城

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等改革举措,着力让农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一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先富带后富”的实现路径。要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通过东西协作、对口支援、对口协作等机制创新,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农、协调发展。二是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要加强对涉农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倾斜,确保乡村振兴资金投向精准、使用高效。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领域,推动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三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城乡产业协作、优势互补,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新时代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项目编号:GD20ZD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学院

自媒体时代下的舆论心理分析

刘书含

从自媒体兴起,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方式及其形态较之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治理的难度和强度日益上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出“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的要求。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管理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自媒体”的概念被广泛接受,源于2003年美国一份名为We Media的研究报告,其定义为“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We Media”该词传入中国,被翻译为“自媒体”。“media”既可译为媒介(强调途径),也可译为媒体(强调以网络新技术进行自主信息发布的个体传播主体)。新华社更是直接使用“self-media”作为英文的回译,这显示在中国的语境中,自媒体更注重“自主”和“主体”的含义。

自媒体的“主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网络中的网民个体,他们的主体身份可以是传播者或受众,还兼具追随者、反对者、沉默者、调和者等多重角色,他们凭借网络平台、各类软件工具进行信息的自主传播;二是因网络意见聚集形成的群体,具有同向的观点和共性的反应。自媒体主体的心理内容和特征将对网络参与行为和整体网络舆论生态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由于这两者的心理内容和特征既有区别,又有交叉重叠的部分,可从心理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认知、情绪、意志进行分析。

认知的有限性:关注危机和群体极化

正如认知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赫伯特·西

蒙(Herbert Simon)所说:“同人类所生活环境的复杂性相比,人类的思维能力非常有限”,人类的思维过程受有限理性的指导,特别是处于信息爆炸的网络空间中,个体有限的心理资源要应用到要求迅速行动的情境里,注意和判断的过程都会有所取舍。

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自我保护的倾向会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威胁到生存和安全的消息,而非带来愉悦或满足的事件。作为个体在传播或接受信息时,注意的焦点更加集中在关乎危机、引致负面情绪的内容上,引发舆论的突发事件大部分均符合此项特点。同时,为了应付某些特定的情境,个体也会产生特定的认知结构,这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称之为“图式”,主体会对同一类客体或活动的基本结构进行抽象概括,形成认知的框图,进而构成个体相对稳定的关于自己和世界总体的态度体系和价值观念。当遇到新的情境时,大脑中的相关图式会被激活,帮助主体去理解和解释这些信息。

每个个体认知图式的形成会有先天和经验的差异,但在社会的层面来说,也具备一定的共性。在舆论事件中,具有共性图式的群体会集聚起来,形成较为统一的公众意见,自媒体的即时表达和积极互动以迅猛之势造就了这个过程。根据群体极化的理论,群体讨论使群体中个体成员所持观点更趋极端,本存差异的认知图式的个体自愿或被迫让位,倒向强势意见一方,“异质化”的声音逐渐消失,自媒体的自主主体特征也会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更加保守或更加激进的意见在舆论中将占据主导地位。

情绪的辐射性:需求满足和风向预示

情绪作为一种混合的心理现象,是个人知觉到的独特处境反应,如果内部或外部环境产生了不平衡的状况,个体就会产生各种需

要。需要得不到满足,负面情绪相应而生,促使个体采取行动恢复到平衡状态。同时,情绪表达的过程本身也可以达成需求满足的目的。当某一客观事件触发个体心理本已存在的需要,情绪表达和宣泄便成为个体转变成自媒体的动机。

情绪不仅代表每个主体的自我感受,还具备传达信息、沟通思想的社会功能,拥有共同需要的个体就会通过网络媒介迅速集聚起来,群体内会出现相似类别的情绪感染,例如,针对2011年“7·23甬温线旅客列车特别重大事故”的微博客基本社会情绪研究发现,公众的悲伤在事故发生第二天达到最高,愤怒在第四、五天上升到最高点。在网络舆论中,相似类别的情绪从个体唤醒发展为群体共振,个体情绪的辐射扩张的状态,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网络自主传播的形式以难以想象的几何倍数速度强化了情绪的辐射性。

由于情绪既作为自媒体发声的动机,又发挥着传达信息的社会功能,所以从心理视角来看,由个体情绪集聚共振而成的公众情绪的变化也预示着舆论的热度变化和论调走向的状态,情绪成为了舆论发展的风向标。当公众情绪被激发,舆论开始被引爆,当公众情绪出现辐射性传导,舆论开始达到高潮,而当公众情绪的宣泄趋于结束,舆论也随之转移至其他引爆点。

意志的主动性:个人意识与舆论休眠

人不仅能对客观世界形成认知,对各类事物产生肯定或否定的情绪,而且还能在活动中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周遭的环境,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在心理学中称之为意志,是有意地确定目的,并通过克服困难和挫折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在关于自媒体的舆论分析中,认知和情绪一直是研究关注的重点,

对意志方面少有涉及,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者普遍受社会心理学的从众理论影响,认为群体中的个体在舆论浪潮中难以保持有意识的觉察状态,显示出更多被动性而非主观能动性。

意志与认知、情绪有密切关系,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调节和控制,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情绪来实现的,反过来,意志的强度有对认知和情绪产生巨大影响。在自媒体中,有两类主体的意志体现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具有强烈个人需要的个体,他们可能是事件的当事人或其相关人员,也可能是对事件有深刻认知和感受的其他传播者。例如2016年江歌案件,由于江歌妈妈的坚持发声,在网络上仍然持续受到关注。二是具备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大咖,即拥有较大关注者群体的注意力生产者和关键意见领袖,对思想表达有强烈欲望,对流量有明确目标,本身也具备一定的意志品质。当主体具备强烈的意志体现时,其情绪宣泄的强度和持续力度都会通过网络舆论引起深刻的社会影响,而这些影响未必都能产生良好的社会示范。例如,拥有千万粉丝的博主“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争议性话题来获取流量和谋取个人利益,最终被官媒直接点名批评乃至封号。

尽管引起自媒体关注的网络舆情事件总有结束的一天,但并不意味着对该事件的印象就会消失。相关舆论也许会暂时进入休眠基调中,但与其同时,意志将显示出其主观能动性,主体之前的经验和感情基调会逐步整合到其认知框架并固定下来,当遇到适当的时机时,主体就会重新激活情绪并再次聚集群体,掀起新的舆论效应。

作者系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助理研究员